
论宋庆龄的反蒋抗日主张及其与中共的关系

唐宝林

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深入,关于宋庆龄的思想活动,也应该本着不断进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考察。本文专就宋庆龄“反蒋抗日”问题,作一些探索。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但在实践中,却走了一条由反蒋抗日到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曲折道路。宋庆龄“反蒋抗日”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蒋介石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宋庆龄反蒋抗日的主要原因。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时,宋庆龄就谴责他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①她目睹了蒋介石统治下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的工人,不是失业,便是在极低的工资、极长的工时、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挨饿和工作。农民受苦受饥,还要受苛捐杂税、高利贷和高地租的掠夺。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被地主豪绅的封建剥削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同时还要受军阀混战的蹂躏。从政治方面来说,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革命分子遭到了监禁、酷刑和屠戮。从文化方面来说,因为国家的预算百分之九十都用在养活军阀

^①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私人军队的军费上面,所以没有钱来举办人民的教育。”^①

1933年5月,宋庆龄在分析日本何以能入侵中国时认为,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之外,中国“国家主要的军队不是用来打日本而是打自己的人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挠人民抵抗,不惜禁止抵制日货,暗害义勇军,并废止人民的民权利”^②等,是主要原因。由此,她得出结论,“抗日”必须“反蒋”,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甚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她强调说:“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③

其次,宋庆龄对蒋介石为人的鄙视,以及因反对蒋介石政府而长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等因素,也加重了她的反蒋情绪。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利用北伐军总司令的地位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宋庆龄就在迁都问题上与蒋有过公开交锋。在这场斗争中,宋庆龄了解了蒋介石的为人:除了私生活糟糕之外,政治品质也很恶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无比愤慨,与武汉的党政领导40多人,于4月22日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盗贼”。^④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出访苏联,流亡欧洲。蒋介石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她,把她当作国民党中央委员对待;一方面又嫉使宋家断其经济来源,使她在海外生活发生困难,妄图迫使宋庆龄屈服。当时宋庆龄的处境的确十分困难,有时甚至连过冬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但宋庆龄却把这视为流氓的政治骚扰,非常鄙夷。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蒋介石特地 在南京为她安排了高级舒适的住宅,还特邀她参加国民党三届二

① 《宋庆龄选集》,第75-76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④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中全会,均遭到宋庆龄的拒绝。蒋介石争取不着而求其次,希望宋庆龄从此在上海隐居下来,对政治局势保持沉默。但是,宋庆龄并不隐居,也不沉默,而是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公开进行反蒋反国民党政府的斗争。8月1日,她针对蒋介石当时制造的“中东路事件”,在寓所向柏林的反帝大同盟拍发电报,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恶。此电被印成中文传单,在当天共产党组织的纪念“国际反战日”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中广为散发。蒋介石恼羞成怒,给宋庆龄罗织“通共”罪名,并派戴季陶登门,软硬兼施进行威胁,警告她“不要再发表宣言”。宋庆龄坚决表示:“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①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宋庆龄的亲密战友邓演达之后,宋对蒋的憎恨达到了极点。12月17日南京又发生政府镇压各地到首都请愿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宋庆龄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她义愤填膺,在19日发表一个重要声明,宣布国民党“死亡”。^②从此,宋庆龄全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投入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蒋介石对宋庆龄的迫害也随之升级,他指使军统特务用监视住宅、跟踪行动、收买保姆、寄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等手段,对宋庆龄进行骚扰,并在1933年6月18日刺杀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对她示以严重警告,甚至设计了一个制造车祸谋害宋庆龄的计划。^③从上述可见,蒋宋矛盾已发展到相互仇恨的地步,加之蒋介石“九一八”后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宋自然采取反蒋抗日的立场。

但是,激烈的反蒋情绪,也使宋庆龄忽视了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条件下,蒋介石国民党有抗日的可能。事实上,蒋在“长期抵抗”

① 《痛斥戴季陶》,《宋庆龄选集》,第43页。

② 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③ 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77—80页。

口号下，一方面加紧剿共，一方面也做了一些抗日的准备工作。而宋庆龄对后者却估计不足，她认为：“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①在长城抗战后的远东反战会议上，她更愤怒谴责说：“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缜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②这就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努力，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等局部抗日斗争完全抹杀了。

二

中国共产党执行反蒋抗日的方针，也对宋庆龄发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就深刻领会到国共合作唤起民众，是孙中山几十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定地继续与共产党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实行妥协，对内继续围剿共产党，共产党也继续执行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方针，采取“反蒋抗日”的立场。由于“反蒋抗日”是宋庆龄和共产党的共同立场，这样，双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合作了。

但是，从1931年开始，王明在共产党内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无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趋势，说什么：“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③

① 《宋庆龄选集》，第76、77页。

② 《宋庆龄选集》，第87、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页。

他提出了“保卫苏联”、“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①的错误口号；把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制订了“打倒国民党是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②的错误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除了在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法西斯恐怖统治方面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之外，也受到中共“左”倾路线的干扰。

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宋庆龄、冯玉祥等予以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其外围组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民救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但是，当时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却认为，这次抗战是十九路军的下层“革命士兵的英勇斗争与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的结果，国民党军阀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彻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掠取“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或者象蔡廷锴等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以取得‘抗日’的报酬”。^③ 据此，他们指示上海党组织在“一二八”抗战中，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到部队中去做争取士兵的工作，在士兵中成立兵士反日会或士兵委员会，“反对投降、妥协与退却的军官”^④，甚至提出“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⑤ 更有甚者，他们把宋庆龄也

①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781页。

② 《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619页。

③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82页。

④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88页。

⑤ 《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75页。

划入以抗日面目“欺骗”群众的“中间派”之列，指示上海党组织，“要和中间派划清界限，不能和宋庆龄、冯玉祥等接触”。^①

由于上述共产党的态度，宋庆龄这时尚未直接受到中共“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二八事变第二天起，她就多次带慰劳品到前线慰问，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官兵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又在民众中积极进行为十九路军募集军饷、筹集棉衣、开设伤兵医院等活动。她还主动支持上海地下党发动的沪西日资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在得知罢工工人生活困难的消息后，即派秘书与“民救会”联系，把募集到的两万元捐款转交他们，帮助工人克服困难。“民救会”领导人深受感动，曾到宋庆龄寓所汇报罢工情况，听取指导。

1933年初，日军向关内进攻，入侵华北，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发布了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恢复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的三条件下，苏维埃红军愿意与任何军队或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声明。为了把这个宣言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共产党改变了“不与宋庆龄接触”的态度，而寻求她的支持帮助。

宋庆龄欢迎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进步。于是双方合作，联合30多个进步团体，发起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任会长。3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的御侮会筹备大会上，宋庆龄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发动中国抗战的四项要求：“（一）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中国；（二）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三）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革命份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②她还在报告中着重宣传了共产党

①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②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新近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

宋庆龄和共产党发起御侮会，宗旨仍是“反蒋抗日”。她在报告中指出：“蒋介石政府不能统一中国，不能领导武装人民进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她号召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讨论四项要求，汇成抗日洪流。^①

但是，由于执行“反蒋抗日”方针，御侮会一开始就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既然断言蒋介石政府不能领导抗日，又何以要求“派遣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军队”去抗日；既然认定蒋介石政府“阻挠人民抵抗”，又何以实现全国抗战。更严重的是，共产党利用御侮会大力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因此，4月中旬，御侮会总会被租界捕房搜查，宣传员在华界发表演讲时被捕。^②

宋庆龄不尽赞同共产党的“左”倾行动。在4月23日，她提出辞去御侮会会长之职，表示“此后仍当以会员一分子之地位”，“努力御侮工作”。^③这是她在自感无力纠正御侮会的“左”倾错误而作的消极抵制。在宋庆龄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上，承担领导之职，旋又辞去，唯有这一次。

共产党没有从御侮会活动受挫、宋庆龄突然辞职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左”倾错误在接着举行的“五一”游行和“飞行集会”中再次升级，终于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御侮会成员60余人被捕，总会及各分会都被国民党市政府查封。主持总会工作的共产党人熊天荆、刘芝明、何云也先后被捕，御侮会就此瓦解。

不过，有些时候或在有的问题上，宋庆龄也明显受到中共“左”倾错误的影响。1933年与中共合作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就是突出一例。

“一二八”抗战时，宋庆龄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反

①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

② 熊天荆：《国民御侮自救会始末》，《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

③ 《宋庆龄致御侮会总会的信》，《申报》1933年4月24日。

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响应宋的呼吁,专门讨论了日本侵略中国问题,并决定派出该委员会副主席巴比塞率领的代表团到中国来重新调查“九一八”事件,正义公道地揭露事件真相,以消除“李顿报告书”的消极影响,同时,召开远东反战会议,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们通知宋庆龄着手筹备这次会议。宋庆龄与中共都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于是合作筹备。由宋庆龄任筹备委员会主席,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进行公开工作,由中共组成的“核心小组”负责具体的实际工作。

国民党政府、上海租界当局及有关各国政府十分害怕这次活动,竭力进行破坏。他们阻挠国际代表团来华,逮捕外国及中国各地来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绑架中共核心小组的全部成员。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与中外反动派斗勇斗智,进行了一番较量,终于在1933年8月18日,迎来了国际代表团。然后,又几经周折,9月30日在反动派意想不到的地方——沪东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探头子住宅隔壁一座红砖洋楼里,成功地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

宋庆龄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报告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分法,对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以及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两种不同的战争观,作了精辟的分析。这表明宋庆龄经过十几年革命斗争的锻炼,理论思想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是,由于宋庆龄筹备会议时受到恐吓信、监视、跟踪等种种迫害,而且她的助手一批批被捕,亲密战友杨杏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这使宋庆龄的反蒋情绪达到了极点。而激烈的反蒋情绪,又使她难以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冷静的分析和判断,易于接受中共“左”倾思想的影响。她在会议上作的报告,明显偏激。

对于当时形势和任务,报告虽然也提了一下日本与英国的冲突在增加,但主要是强调他们反苏和瓜分中国的一致性。说日本侵华是新一轮“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瓜分中国的运动”,号召开展“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又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

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提出“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的口号。这些文字，几乎都录自当时“左”倾共产党中央的文件。

在斗争策略上，报告除了把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并列加以反对外，对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加区别统统反对，尤其是福建、两广地方实力派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已经开始，报告却仍强调“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所以，报告总的精神不是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日救亡，而是强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的革命战争。报告认为：“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着重号系宋庆龄所加）^①这个提法，等于接受了“左”倾中央把推翻国民党统治作为抗日“先决条件”的原则。

宋庆龄的上述偏激观点，除了受到共产党“左”倾思想影响外，还有她自己经验主义的原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帝国主义侵华的基本特点是瓜分中国。宋庆龄对此具有深切认识，但对“九一八”以后，日本坚决排斥其他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的新形势，却认识不足。宋庆龄不加区别地对待国民党各派系的失误，突出表现在她与陈铭枢为首的第三党的关系方面。第三党是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展而来的。1927年11月，为继续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挽救国民党，宋庆龄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发起成立这个委员会。但是后来，见到第三党因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而与共产党对立，脱离工农而只靠反蒋派军阀活动，宋庆龄即脱离该组织，只维持与邓演达的私人友谊。邓演达被害后，她就与该组织彻底划清界线了。在1933年第三党与十九路军及广东反蒋派组织福建人民政府进行“反蒋抗日”时，她甚至把他们斥为“军阀政客集团”，非但不支持，还宣布：

^① 《宋庆龄选集》，第84—91页。

“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1] 说宋庆龄这个态度含有经验主义的因素，是因为她与孙中山最后十年的奋斗中，曾多次上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的当。因此杯弓蛇影，她不敢利用他们与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团结他们共同斗争。

远东反战会议结束后，各国代表回国发动群众支援中国抗日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宋庆龄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的一次胜利。许多论著对这次胜利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会议原定中外正式代表 800 人，公开举行群众大会，以造成广泛的影响，结果只举行了 65 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国际代表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抵销国联李顿调查报告书影响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大会提出的目标——“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远未达到。

然而，由于民族危机迅速加深，更由于宋庆龄爱国主义的传统和实事求是作风的深厚基础，她在“左”倾的道路上没有走远。

1934 年 4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狂悖声明，俨然以“东亚主人”自居，视中国为其保护国，为日本进一步大规模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引起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强烈震动。同时，蒋介石向南方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已经进入苏区的“左”倾中共中央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反围剿战争不断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军事反围剿的同时，为在政治上瓦解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再次与宋庆龄合作，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准备发表宣言，掀起抗日斗争的新高潮。但是，4 月 20 日宋庆龄等签名公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

[1] 《申报》，1933 年 11 月 22 日

领”，却不是中共原定的“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①，而变成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②

“六大纲领”与“五大纲领”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一条，而且思想内容上有重大的修改：

一，把“坚持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及“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改为“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这样，既突出了抗日和反对一切内战，又避免了对蒋介石集团和其他派系的攻击。

二，把“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与胜利的保证”及“全中国的民众必须起来”，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改为“全体人民总武装”，“全体人民总动员——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这就把当时共产党强调的只有“工农民众”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扩大为全民族各阶级参加的“抗日战争”。

三，把“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改为“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把“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改为“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就把国际上打倒一切，变成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六大纲领”中增加的一条是：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共产党请宋庆龄出任该委员会筹备会会长。宋庆龄后来谈到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怎样由她签名公布的情况时说：“是午夜，由地下党召集会议。我是会长，宣布了六大纲领。参加会议的还有美、法、比国某些著名领导人以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557页。

② 《宋庆龄选集》，第92页。

及其他代表等。”^①

从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和宋庆龄的思想状况看，“六大纲领”的精神，主要体现了宋庆龄的思想，所以，解放后，这个所谓“党的文件”收进了《宋庆龄选集》；而这个文件对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来说却是被动的。这在4月20日“六大纲领”公布当天中共中央给全国各级组织的秘密指示信中表现得很清楚。这封指示信表示，共产党所以作此策略上的让步，是为了争取象宋庆龄这样“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和其他“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人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以使这个纲领在尽量广大的范围内传播。指示信中还说：“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分子惯用左倾词句的情绪，而企图将这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要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在群众斗争有了广大发展时，我们有一切的可能逐步提出更加左倾、更加急进的纲领来补充。”同时，指示信又要求各级组织在执行“六大纲领”时，采取实际上“阳奉阴违”的态度。与“五大纲领”相比，“六大纲领”的基本精神自然是减低阶级斗争和反国民党斗争的。但指示信却说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误解为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的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国民党斗争”。^② 纲领公布后不到三个月，博古就“四二〇”宣言发表演说时，只字未提“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而却把那个未曾出世的有浓重“左”倾色彩的“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偷偷地捅了出来，以证明中央三年来的“左”倾路线是“一贯正确”的。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公布，和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对正在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认识有了提高，开始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民族斗争方面；同时

① 转引自张珏：《“老年人”回忆宋庆龄》，《红旗飘飘》第27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229页。

也表明共产党为开展抗日斗争更加重视宋庆龄的作用。“六大纲领”公布后,得到全国广泛的拥护。在上面签名的有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的代表,除了爱国民主人士之外,还包括许多地方实力派,甚至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等。这就为以后中共提出建立包括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英美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准备。

综上所述,1931—1935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因受到中共“左”倾错误的影响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有些失误,但是在斗争中,由于她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及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她能强调抗日救国的重要性,掌握抗日斗争的大方向,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且给共产党以帮助,抵制一些“左”倾的行动;“反蒋”也主要是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不赞成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来干扰抗日斗争。然而,由于个人力量的局限,宋庆龄很难扭转国共两党的基本方针。

三

从宏观上看,1931—1935年,在国共双方严重对立的态势下,宋庆龄进行反蒋抗日,实际得到的结果是不断地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心和暴行,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中国,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未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推动其由不抵抗到抵抗,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撇开国民党,建立人民抗日政权领导全国抗战的努力无法成功;有效地启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的觉悟,使抗日斗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但是未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宋庆龄的反蒋抗日活动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实际上,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后,由于蒋介石还未放弃“剿共”政策,共产党在执行“六大纲领”时又强调加强阶级斗争和反国民党斗争,因此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个非法的共产党外

围组织,只能进行秘密活动,难以承担宋庆龄和中共所期望的角色——“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宋庆龄虽然身居会长之职,但与它只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而且,从1935年起,面对着几年来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反蒋”和“抗日”两方面,都已处于难以有所作为的困境。

这时,共产党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白区的组织和工作几乎全部丧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处于更加严重的困境中。

无独有偶,国民党方面,也由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日本进逼华北,同样处于困境中。

中华民族走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首先从困境中走出的是共产党。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又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改变方针,实行联苏制日的方针,开始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多年来坚持的反蒋反国民党的立场的主要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她与蒋介石集团的个人恩怨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大形势下,也已降到次要地位。于是,从1935年底开始,宋庆龄的立场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首先,宋庆龄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中,国民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孙中山制订的国民党领导、国共合作救国的方案,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正如她在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时所说:“只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救中国于危亡。”^①但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必须依靠“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因此国共合作就成了挽救时局的唯一出路。近十年中,宋庆龄见国共破裂难以弥合,曾试图以国民党左派代替国民党与中共合作,为此她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但都失败了。所以,她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做推动国共合作的工作。她对国共两党的错误政策都进行了批评,指

^①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抗战》(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出：“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以致两党互相残杀，牺牲无数有为的青年，损失无数宝贵的精力，以从事内争，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①

同时，宋庆龄也进行自我反省，认为造成这种危局，“不是一二人的责任，也不是任何党派的责任，凡我国共两党同志都要内心自责”。^②她特别强调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的问题”。^③于是，她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忘记过去“内部倾轧的误会和痛苦”^④；“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⑤

宋庆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她在1935年后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中，爱国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作风是怎样起着主导的作用。

从“反蒋抗日”的历史怪圈中走出来后，宋庆龄以坚定的步伐，迈向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宽广道路。她的观察和思考，也豁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过去完全抹杀国民党国内建设的成绩，现在则承认政府几年来铁道和公路建设、财政改革等，“有一些进展”^⑥；

过去猛烈抨击国民党出卖华北，出卖全中国，现在则称赞政府“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致使日本企图占领华北的种种努力“已经失败”。“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⑦；

①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

② 同上。

③ 《宋庆龄选集》，第115页。

④ 宋庆龄：《两个十月》，《抗战》（三日刊）第24号，1937年11月6日。

⑤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

⑥ 《宋庆龄选集》，第100、117页。

⑦ 《宋庆龄选集》，第99页。

过去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现在则站在民族立场上,对国共双方都做工作。她提醒着:“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共产党同志也应该记住:只有在孙总理遗教领导之下,和中国国民党真诚坦白合作,把全民打成一片,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①

过去谴责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是“封建军阀割据”,现在则称他们是“爱国主义”和“新生力量”^②;

过去痛恨国家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从事劫掠,屠杀工农,毁坏他们的家园,给他们留下了不幸与灾祸”;现在则提倡“我们要有军事的头脑,要竭力改正我国人民对于为拯救祖国而战的战士们的看法”,必须改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③

宋庆龄思想上的转变也转化为行动。为了民族大义,她毅然捐弃前嫌,履行1929年5月许下的诺言^④,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解。1935年底,当宋子文请求她把国民党中央愿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传递给刚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时,她欣然同意,随即派中共地下情报员董健吾赴瓦窑堡。中共中央也立即作出积极反应,愿与国民党举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并首次正式提出实现这种合作的要求。1936年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当国共两党都十分激动,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时刻,宋庆龄曾决定亲赴西安,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条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⑤1937年2月,她终于在抵制十年后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并且与

①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

② 《宋庆龄选集》,第115、117页。

③ 《宋庆龄选集》,第108页。

④ 当时宋庆龄发表声明,称在国民党政策完全符合孙中山的三项基本原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联合苏联,实现工农政策——之前,不参加该党的任何工作。

⑤ 后因南京部署轰炸西安,旋义局势好转,和平解决事变,宋的西安之行未成。参见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何香凝、冯玉祥等一起提议案，作演讲，促使国民党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政策。

宋庆龄由反蒋抗日转变到拥蒋抗日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曲折过程表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在复杂的斗争中逐步成熟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简讯 ·

台儿庄大战 55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儿庄举行

1993年4月8日—11日，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印度，西班牙的12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当年台儿庄大战的部分参战将士和亲属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枣庄市政府、台儿庄区政府主办，得到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等出席讲话。

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台儿庄大战的经过和胜利原因、国民政府的战略方针、国共两党在台儿庄大战中的作用、参战将领与参战部队、台儿庄大战的历史地位等。与会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学术研讨会开幕的当天，还举行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落成典礼。与会学者参观考察了台儿庄中正门、清真寺、火车站等台儿庄大战遗址，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展览。

这次学术研讨会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台儿庄战役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它对推动学术发展增进学术交流起了有益作用。

（培平）

· 85 ·